

港產片 2萬元戲院上畫 蔡敬文

導演們的其中一個夢想，一定是能在戲院大銀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然而若從未執導過任何知名度的電影以吸引投資者的目光，或沒有任何資金、人事關係，即使像現在任何人都可以隨手拿起手機、相機或Video Cam來拍片，但要完成上述夢想談何容易。於是《不設房》在主流戲院的上映就帶點奇蹟的意味，即使只是作限量放映。

《不設房》是一齣只以2萬元製作的90分鐘電影，全片以單鏡反光相機拍攝，然而卻充分證明低成本製作的獨立電影不一定業餘、實驗性，又或者「甩甩漏漏」，《不設房》有一個極為完整的故事，是一齣甚具娛樂性的社會諷刺喜劇。導演蔡敬文最初想拍攝一個靠領綜援過活，蝸居紅磡「劏房」的年青人怎

樣和一名國內來港的妓女一起生活的荒誕故事，同時亦對香港各大社會問題如地產霸權、劏房、貧富懸殊等問題迎頭痛擊，當時還沒有長遠想過放映的問題，最壞的打算就是在太空館或藝術中心等租借場地，只邀請親朋好友來看片，最後再推出影碟「博回本」。然而因為機緣巧合，卻得以分別在香港藝術中心及The Grand Cinema作限量放映共六場，在接近零宣傳、導演和演員都是零知名度的情況下，仍場場滿座，證明不一定要大製作大卡士，只要有好劇本，能引起大眾共鳴的電影，還是能吸引觀眾到場。

所謂的機緣巧合，要由蔡敬文的首部作品《世界很好我們很糟》說起。「2009年我在完成《世》後，自己將它印

成幾百隻包裝好的影碟，拿到旺角信和中心於影碟商店寄賣，當時碰巧有一間大型影碟發行公司的買手在找外國冷門影碟發行，我和他交換了聯絡電話，之後這間公司幫我把《世》的影碟發行至HMV及CD Warehouse這類大型唱片連鎖店，合作就是這樣開始。」

2010年蔡敬文以七個月完成《不設房》的製作，自己「一腳踢」擔任電影的導演、編劇、攝影、剪接、燈光、後期製作甚至宣傳設計等崗位，由於作品的水準不俗，再次獲該影碟發行公司垂青，為他穿針引線，安排於藝術中心及The Grand放映，入座率理想，於是The Grand於11月23日再度安排放映。「由於自己可以一身兼數職，不計器材這些『搵食工具』的長期投資，《不設房》只



文：金寶
蔡敬文(左一)在製作現場

是用了約2萬元製作，主要都是用於演員的人工及歌曲的版權費，六場的放映已令投資接近回本，明年推出影碟相信更有利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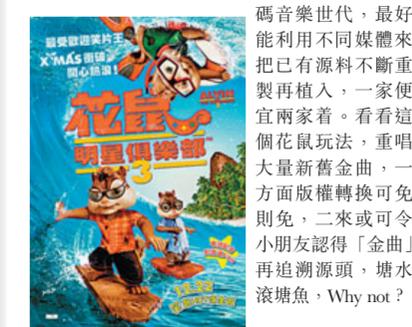
雖然在別人眼中幾萬元的收入或只是蠅頭小利，但獨立電影在完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仍可做到有利可圖絕不簡單，亦只如蔡敬文所說：「我的目標是不用蝕錢，現在多了觀眾或客戶認識我，已肯定是有賺了。」

影音館 《花鼠明星俱樂部3》——潛移默化

花鼠仔(Alvin and the Chipmunks)自1958年誕生，1980年代動畫版首度變身，2007年動畫終極進化之後，來到今年聖誕，電影版亦去到第三集，繼續用其超頻率勁爆歌聲，加上易入口式笑料，輕易成為在沒有甚麼「出格」聖誕主題電影下的合家歡電影之選。本集講述準備放假的花鼠仔所乘搭的郵輪擱淺，結果落得要在荒島上繼續狂歡的下場……電影原聲當然由一眾花鼠仔傾力演唱，今集還有花鼠女坐鎮，十足Boyz 2 Men加上Destiny's Child，流行味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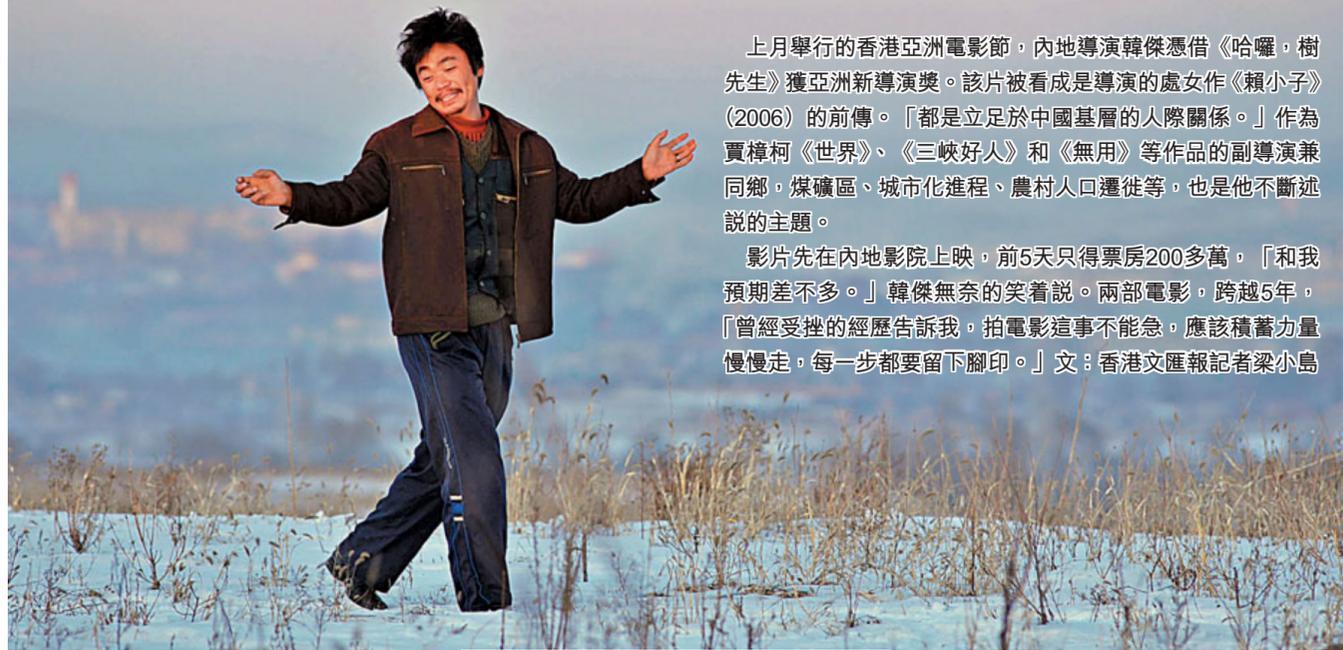
電影原聲大碟，表面上是花鼠仔花鼠女歌力獻技，但看看曲單，不難發現事實上參與的單位殊不簡單——Johnny O'Keefe、Destiny's Child、Lady GaGa、O'Jays、Weezer……不同年代不同曲風，卻以花鼠一貫「急激尖刺」歌喉包裝，派對跟狂歡味十足。當中以〈Party Rock Anthem〉、〈Survivor〉和〈Love Train〉搞得最過癮，絕對適合「合家歡sing along」！然而，要集齊所有好歌，也不容易。《花3》這張原聲有三個版本，一為普通版、二為iTune加強版、三為加強限量版，所有版本合起來使得本電影的歌曲多達20首之多，可想而知，為配合電影的狂歡橋段而置入的音樂數量頗多，希望能真正炒熱劇情推動氣氛就好。

以前，不論電視劇或電影，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其主題曲/主題音樂，即使未真正接觸過片集/電影，例如《職業特工隊》、《俠聖》、《無敵金剛》、《夏威夷探案》，即使只跟人家說起：「就是那個bum bum bum bum (哼唱)的片集啊！」絕不難對號入座。反觀現在，音樂工業仍然面對重重挑戰，製作費縮水又強行衝擊數碼音樂世代，最好能利用不同媒體來把已有源料不斷重製再植入，一家便宜兩家着。看看這個花鼠玩法，重唱大量新舊金曲，一方面版權轉換可免則免，二來或可令小朋友認得「金曲」再追溯源頭，塘水滾塘魚，Why not?



文：大秀

哈囉，韓傑 新導演的陣痛



上月舉行的香港亞洲電影節，內地導演韓傑憑借《哈囉，樹先生》獲亞洲新導演獎。該片被看成是導演的處女作《賴小子》(2006)的前傳。「都是立足於中國基層的人際關係。」作為賈樟柯《世界》、《三峽好人》和《無用》等作品的副導演兼同鄉，煤礦區、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遷徙等，也是他不斷述說的主題。

影片先在內地影院上映，前5天只得票房200多萬，「和我預期差不多。」韓傑無奈的笑着說。兩部電影，跨越5年，「曾經受挫的經歷告訴我，拍電影這事不能急，應該積蓄力量慢慢走，每一步都要留下腳印。」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小島

韓傑的電影之路的起點很高。《賴小子》獲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虎獎時，他才28歲，賈樟柯是他的投資人及監製。影片用非職業演員，用山西方言，建構的是在成人無暇也無力照管下，一群遊蕩在山西農村的少年四處宣洩的青春。有人比較他和賈樟柯，說他更加憤怒，戾氣重。

《哈囉，樹先生》是導演口中的「長大成人賴小子們」：主人公是一名單身、無業，面臨村莊被整體搬遷，並常出現臆想症的中年男人(樹先生)，他的童年玩伴有的成為當地靠賣農地上位的暴發戶，有的則進城開補習社，做了「城裡人」。憤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毫無出路的無助。

村莊搬遷引發的思考

韓傑的老家在山西呂梁，盛產煤礦。「一個村莊的變遷，很多是因為煤層的開採，這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煤礦開採的狀況，從80年代的小規模開採，到2000年後，因為政策的改變，變成集團化開採，令小煤礦慢慢消失。」導演說：「集團化開採通常是將整個村莊買下來，再深入挖掘，對村子的生態影響更嚴重。」他為此做過社會調查，在網絡論壇中發現不少因煤礦開採而被城市化的案例，有農民向媒體不斷投訴。「我記得網上有一個年輕小伙子要告一個大的煤礦集團，後者和當地政府有合約，聯合讓小鎮搬遷，但賠償部分出了問題。當時答應給他帶小院的平房，結果只給了他們單元房。」

而連續七八年來，韓傑也都不斷聽到來自老家正發生的搬遷的事件。「有的年輕人能力強，搬到城市，有車有房，混得還不錯，但留在村裡的只有老人和小孩，以及像樹先生這樣被人遺忘的中年人。」

電影取點不在他的老家山西，而是東北，人物們也改成說東北話，比起低調的山西方言，東北話更有娛樂性的象徵。「北方綿綿起伏的丘陵，很有詩意的感覺，而且東北村莊的形態和我的故事設定的場景很像，比如一座新城周圍蓋着一圈新樓盤，這是典型的城市化過程。」

但他也沒有否認在電影中添加的娛樂元素，職業演員是上院線的前提條件，東北話在媒體形象中積累成的戲虐效果，也是重要考量，「但這只是我的策略，不是妥協。現下中國電影市場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做一些調整去迎合局面。」

韓傑說自己是雜學出身，初中時代就是影迷，加上從小喜歡畫畫，走上拍電影的道路是注定的事情。「我蠢蠢欲動很多年，但家庭卻安排你學計算機，他們認為這是一門可靠的手藝，結果我走了一些彎路。」後來他考進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讀影視製作，燃起了創作的渴求。

不向娛樂妥協

「我的兩部片都是主人公從農村出發到外地，再回來，這也是我的處境，也是我創作的母題，而且始終



導演韓傑。

捨棄不下對煤礦的批判。」《哈囉，樹先生》有夢境、有幻覺，甚至還有占卜卦，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導演認為是人物和社會現實的需要，但也引起部分觀眾的非議，認為是故弄玄虛。這種態度顯然令他不快也不滿。「很多人說看不懂，這讓我比較失望。」他說，他本來希望影片和當下城市裡白領階層做一個對話，「但這個對話沒有效。很多城市中產階級有一種心態，覺得他們在引領時代進步，懂時尚，有話語權，但當火熱的樹先生推出來後，他們又看不到你要表達甚麼，甚至還產生了反感情緒。」

《賴小子》當時在農村放映時，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計劃《樹先生》下院線後再跑一趟三線城市，給農民放。」這也是一種無奈之舉，他承認這裡面有糾結心，他明白城市知識分子、有思考能力的中產，才是他電影希望得到的觀眾。

他自己也經歷了迷茫和焦躁期。從第一部《賴小子》到近作，5年時間他只從事少量的商業拍攝，也做過藝術短片，嘗試和職業演員合作，對原創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行活做太多，思維方式也會被改寫。」2008年，他創作的一個有關城市家庭的倫理劇本審查沒有通過，對他打擊很大。

「現在很多電影其實都被利用了，娛樂越做越大，電影越來越小，電影本身的力量沒有了，只成為賺錢的工具。我並不是在否認娛樂，而是娛樂的背後還要

有東西。最典型的是姜文後來的《太陽照常升起》和《讓子彈飛》。他說，前一次是上帝送給他的禮物，後一次是他送給觀眾的禮物。那句話是非常大的諷刺，就是說，當導演給你掏心窩時，觀眾會看不起。有人在《讓子彈飛》看到了反動意識，其實那只是電影的噱頭。用娛樂包裝，就能把觀眾幹掉。」

但形勢怎樣艱難都不能放棄，只是需要調整。他說他下部拍的商業片，包裝會再厚些，但還要引起大家的思考。「曾經受挫的經歷告訴我，拍電影這事不能急，應該積蓄力量慢慢走，每一步都要留下腳印。」



王寶強(前一)飾演農村底層人物樹先生。



人物線索眾多，韓傑說，結構像樹。



魔幻現實是人物和社會現實的需要。

一手好碟

文：勇先

食人肉的元祖《Alive》

近期電視台熱播的重頭劇集《天與地》，在宣傳初期，輿論和網民均羅列種種證據，指該劇明顯是影射Beyond樂隊。不過雖然陳豪、林保怡和黃德斌在戲中同是夾band，但實在找不到Beyond的影子，反而令我想起了一套同樣是講在被困雪山時食人肉的舊作《Alive》(港譯《天劫餘生》)。

《天劫餘生》是改編自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背景是發生於1972年，一隊橄欖球隊原本乘坐飛機浩浩蕩蕩到智利參賽，但不幸失事撞向雪山。雖有人命傷亡，但大部分人仍幸存。起初各人對生存仍充滿盼望，認為自己很快會獲救。可是幾天過去，拯救隊因搜尋不果而放棄搜索，更禍不單行遇上雪崩之災。面對僅餘的糧食已經清空的狀況下，剩下的就只有一具具被「冰鮮」着的遇難者的屍體，幸存者眼前面臨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甚麼也不做凍死餓死，要麼把屍體當作食物。起初所有人都認為這個提議是不可思議的大逆不道，但隨著第一個人走出來，拿着一把小刀，從一具屍體的臀部割下一塊肉，平靜地吃下之後……文明的規範，開始在這個群體裡崩潰。愈來愈多人選擇食人肉，甚至從原本滿懷惡感的吃，到後來講究地吧人肉烤熟來吃。後來全靠兩名主角蘭度和羅拔翻過雪山聯絡到外間求救，這個「人吃人」的悲劇才能終結——但已經是空難後七十多日的事情了。

據說現實中這些幸存者本來協議終生不跟其他人透露在雪山上的非人經歷。而無錢的《天與地》中，林保怡、陳豪和黃德斌的角色亦有類似的協定。這些故事的震撼和具爭議之處，其實並不在於食人肉的畫面過於血腥噁心，而是讓人驚覺所謂建立了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原來是如此不堪一擊，人類置身在無情的大自然之中，隨時與野獸無異。幸好，故事最終的調子有着積極的一面，至少是歌頌着無論是遇難者或幸存者，即使面對可怕的災難，也有着一份拚力求生的勇氣，而不是一味捕捉「食人」這骨節上的陰暗面。

悲劇不一定只有沉鬱，它還有一種「功效」，就是讓我們一眾自以為是文明的萬物之靈，在大自然，甚至在別人面前，學懂甚麼叫謙卑。

